

李歐梵《上海摩登》 對「商務印書館」的論述商榷

劉怡伶

摘要

李歐梵的經典之作——《上海摩登》具有宏觀視野，書中許多觀點深具啟發，但是有關「商務印書館」的問題方面，卻有待商榷與補充。本文的討論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一、其忽略了經營商務印書館的重要人物張元濟；二、其對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發刊狀況的說法，對照實際頗有出入；三、其誤以《申報》為商務印書館之刊物。

一、前言

李歐梵（1939-）撰寫《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 1930-1945》（本文簡稱《上海摩登》）^[1]，以耳目一新的文化評論風格——正經但又不刻板、嚴

關鍵詞 (Keywords)：李歐梵；上海；摩登；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申報；張元濟；出版

Leo Oufan Lee；Shanghai；Modern；The Commercial Press；The Eastern Miscellany；Shenbao；Zhang Yuan Ji；Publishing

劉怡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E-mail: ncnuncue@yahoo.com.tw

[1] 李歐梵 (Leo Oufan Lee) 著，毛尖譯，《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 1930-1945》(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增訂本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6)。按：該著早先由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出英文版 (1999 年)，之後的中文繁體、簡體版分別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00 年) 以及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1 年) 出版。2006 年增訂本有別於先前繁體版的簡略目錄，增加了較為詳細的章節標目；註釋也改採當頁見註，省去章節後註釋的前後翻檢之不便；書末又增補三文〈《上海摩登》韓文版序〉、〈重繪上海文化地圖〉、〈漫談 (上海) 懷舊〉列為附錄。至於內容方面，部分文字略有修飾。本文所據為最新中文增訂本。由於是書原係英文撰寫，後由李歐梵學生毛尖翻

肅卻又充滿想像力的方式，勾勒出上海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在材料運用上，發覺印刷與視覺的潛力，不僅透過公共空間（建築、百貨公司、咖啡廳、跑馬場等）、媒體、小說，更從廣告、海報、雜誌、電影等視覺媒介，以分析上海三、四十年代的新都會文化，相較於傳統政治界、學術界的大論述，李歐梵以這些零星瑣碎的媒材，嘗試拼貼出當時的文化想像，其研究進路看似小道，但成果卻斐然可觀，尤其採用另類文本——晚清以迄民國之蔚然而興的印刷媒體，如商務印書館、良友圖書公司，探討中國現代性的問題，可謂別具隻眼。

《上海摩登》之第二章〈印刷文化與現代性建構〉涉及商務印書館的雜誌、教科書、文庫三方面，分別筆成下列三節：〈《東方雜誌》：一份中層刊物〉、〈啓蒙事業：教科書〉、〈啓蒙事業：文庫〉。李歐梵說：^[2]

商務在教育體系的現代化過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自一九〇五年取消科舉後，這成了一項填補民族需要的巨大工程。

又云：^[3]

一個出版公司如何通過集體努力，成功地實現了其自定的「啓蒙」任務，而且他們的努力也促進了共和政府的民族建構。

李歐梵選擇近現代大規模、對各個領域有全面影響的商務印書館作為分析對象，確實是一個特殊且鮮為學者涉足的研究範疇，商務印書館自 1897 年創館以來迄今已逾百年，直到現在，無論是文化的傳播與累積、知識的推廣與普及，依舊發揮著影響力。《上海摩登》被葉文心讚曰：「此書是一部博大精深的文化史」、「觀察入微，令人驚嘆」、「現代中國新型文化史的大手筆」；王德威更云此書之成就最高，是其他書「無以比擬的」。^[4] 李歐梵這部研究現代上海發展的

譯，譯者非李歐梵本人，亦即本文字斟酌的考辨雖以中譯本為準，但其關鍵敘述仍會溯源英文本以互為對照，釐清原著或翻譯上的問題。又按：李歐梵，海內外著名學者，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博士、中央研究院院士，專研中國近現代思想與文學，2004 年自哈佛大學退休。曾任教香港中文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印地安那大學、芝加哥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大學。著述有：《西潮的彼岸》、《鐵屋中的吶喊：魯迅研究》、《中西文學的徊想》、《徘徊在現代與後現代之間》、《現代性的追求》、《浪漫之餘》、《范柳原懺情錄》、《東方獵手》、《狐狸洞話語》、《世紀末囁語》、《城市奏鳴曲》、《都市漫遊者》、《清水灣畔的臆語》、《我的哈佛歲月》、《又一城狂想曲》等。

[2] 李歐梵 (Leo Oufan Lee) 著，毛尖譯，《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 1930-1945》(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增訂本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6)，頁 60。

[3] 同註 2，頁 62。

[4] 葉文心、王德威語，見：同註 2，封面摺頁。

經典作品《上海摩登》，重視觀念啓發，是該書很大的優點，但在文本解讀、史料鉤沉方面卻有若干不足之處，值得商榷或補強。《上海摩登》內容豐富、面向亦廣，本文只擬於該書提及商務印書館的部分立論，儘管商務印書館的出版文化僅是《上海摩登》所欲處理的一小部分，故以此論李氏之誤，不無比例失衡之虞，然而基於學術標準，求其嚴謹應是治學者的基本態度，故不厭其繁撰文以辨，針對該書中圍繞在「商務印書館」的幾個問題而發。

二、對商務印書館的文教啓蒙推手——張元濟的忽略

李歐梵自商務印書館所出教科書及其登載的廣告內容判斷，這間當時最大的出版機構有自己的教育理念及出版品：不單爲了供給學校課程，也是爲課程外活動提供的。舉凡寓言故事、翻譯小說、圖畫書、卡通、彩色明信片、地圖、簡單算術、遊戲和玩具書等，這些販售品緊緊抓住都市市場的新顧客——孩子和他們的母親。^[5] 以上係就學校教育而言，至於社會教育方面，商務印書館其實更開辦多元的學習管道，誠如李歐梵所說：^[6]

教程外的出版物也早就超越了學校體系的局限，進入了因爲謀生而失學的都市成人世界中。

該館致力學校教育，社會教育與通俗教育亦不輕忽，例如：創設養真幼兒園、藝徒學校、儀器標本實驗所等機構。另斥資籌辦培育師資的師範講習班、講習社；而爲了訓練與提升商務印書館各單位職工的素質以及讓一般社會大眾也有受教機會，又開辦函授學校、補習學校和勵志平民的夜校等。這些體制外的補助教育，可算是新的學習途徑，受教對象與範圍涵蓋極廣，年紀由小至大無所不包，各行各業都有。至於其學習方法，或採學員直接到班聽課、或採函授式教學，尤其函授教育突破時空的限制，方便有心向學者吸收知識。這種多面向的關注，正是李歐梵所揭櫫：^[7]

在我看來，正是在都市社會的這個公眾範圍裡，商務的「啓蒙」任務扮演了主角，在政府政策的意識形態局限外，提供了一幅現代性景觀。

這「提供了一幅現代性景觀」的建構者，當首推該館領導者——張元濟（1867-1959）^[8]，他帶領商務印書館從「文化經營」到「經營文化」，其教育的理

[5] 同註 2，頁 63。

[6] 同註 2，頁 63。

[7] 同註 2，頁 63。

[8] 關於張元濟之其人其事，參見：張樹年，《我的父親張元濟》（上海：東方出版中心，

念與落實，更與商務印書館之發展息息相關。^[9] 李歐梵談及該館文教事業，於張元濟卻全無著墨，雖然他事先已表明：^[10]

我在本書探討都市現代性基於這樣的一種假設：不同於對傳統知識份子所作精英化處理，其僅僅探討個別思想家的基本觀點，我以為文化史家的任務是要探索我們所說的「文化想像」。因為「文化想像」本身可以被界定為集體感性之輪廓和文化產品之意味。我們也就必須同時對這種闡釋策略的雙向目標作出深思，深入思考這種文化產品的社會和體制語境，以及構建和交流這種想像的形式。換言之，我們不能忽略「表面」，意象和風格並不一定進入深層思維，但它們必然召喚出一種集體「想像」。在我看來，「現代性」既是概念也是想像，既是核心也是表面。

1997)；張人鳳，《智民之師——張元濟》(濟南：山東畫報，1998)；葉宋曼瑛，《The Life and Times of Zhang Yuanji 1867-1959》(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按：張樹年為張元濟之子，其書描寫父親生前的點點滴滴，包含私人與公共領域的諸多生活經驗談。張人鳳則為張樹年之子(即張元濟之嫡長孫)，張人鳳該書收錄了48張珍貴圖片，頗具史料價值。葉宋曼瑛書乃其英文版的博士論文，另有中譯本，為張人鳳與鄒振環所合譯，書名為《從翰林到出版家——張元濟的生平與事業》(香港：商務印書館，1992)。

^[9] 本文匿名審查人謂「只強調張元濟一人，必須要提出更有力的理由」，茲補充說明如下：本文強調張元濟一人，不意味排除其他重要的商務高層如：高夢旦、王雲五、胡愈之的貢獻，亦非輕忽其他與該館發展有重要關係者如蔡元培、胡適的寶貴建言。其最主要是因在商務印書館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時期，張元濟的所作所為具有關鍵作用。追本溯源，高夢旦與王雲五、胡愈之都是張元濟延攬來的人才，如果沒有張元濟這只「濾鏡」，商務印書館的教科書編印事業以及後來該館推展大計畫與科學化的管理，能否有效實踐不無疑問，王雲五對於張元濟提攜與相助甚為感念，曾云：「在此時期，我的一切措施，他(筆者按：張元濟)無不贊助，一方面由於他愛護商務印書館，他方面也因為我們之間已經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不管他的年紀比我大了廿多年，而且我在商務印書館各當局中是最後進，他總是把我視為『平等相待無話不談』的朋友。」見：王雲五，〈張菊老與商務印書館〉，《傳記文學》，4：1(1964.1)，頁16；解放後首任國家出版總署署長胡愈之早年也因張元濟賞識其文才而允其入館，由該館練習生擢升至《東方雜誌》編輯助理、主編，此見胡序文，〈胡愈之和商務印書館〉，《1897-1987 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頁125-130。至於張元濟也曾分別延請過蔡元培、胡適擔任該館編譯所所長職務，蔡元培一度就任但旋因「蘇報案」而離開；胡適則不願放棄已有的北大教授教職而改業「完全為人」的出版工作，婉拒了直接參與出版事業，胡適在日記裡記載：「張菊生(筆者按：張元濟)來談。……這個編譯所確是很要緊的一個教育機關——一種教育大勢力。我現在所以遲疑，只因為我是三十歲的人，不應該放棄自己的事，去辦那完全為人的事。」見胡適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主編，《胡適的日記》(香港：中華書局，1985)，頁23-24。簡言之，縱使商務印書館身為中國出版業的龍頭是由幕後多人合作的結果，但張元濟的關鍵影響應不能忽視，李歐梵《上海摩登》表示不解出版機構與政府政策間的互動關係，張元濟主導的文教事業及時人的相關說法，或可補充李書這方面的不足。

^[10] 同註2，頁75。

我把這「概念」部份留給其他學者或我的另一本書去做，我在此打算大膽地通過「解讀」報刊上的大量圖片和廣告，把我的筆墨都放到「表面上」。

李歐梵很清楚地告訴讀者，此書既不研究個別人物的基本觀點，亦不擬鑽研深層的出版事業，而是透過解讀報刊上的大量圖片、廣告來探索「文化想像」。因此，他自認筆墨都放到出版事業的「表面上」，這番表白無疑為自己不熟悉近代出版事務的可能缺憾，施打了預防針。換言之，若以原本就不擬深究的問題質疑此書，讀者反而顯得不厚道了。李歐梵鎖定研究對象的大問題，固然可使本書不必理會枝枝節節的小問題，但這種割裂內、外的大學小遺思考，卻也註定了漏失可資參考的一些相關線索。例如李歐梵對於出版機構是否願意配合當時教育部的一些政策的問題，坦言無法明確得悉，他說：^[11]

我們現在不太可能確證出版公司是否嚴格執行了政策上的這些變動。作為最大出版社的商務可能發展出了自己的教育觀，它雖然不和政府法令相抵觸，但可能已超越了指定課程。

其實，只要查詢商務印書館的重要刊物以及張元濟的相關說法，就可以為李歐梵這段不確定的陳述提出答案。以教科書而言，商務印書館原則上配合教育制度和潮流發展，編訂適應時代需求的教本，例如 1902 年清廷頒布學堂章程，即依學制編輯《最新教科書》；辛亥民初之際，臨時政府之教育部下令凡教科書不合共和宗旨者，逐一改正，遂推出《共和教科書》；1920 年，教育部推行國語運動而編了《新法教科書》；1922 年，遵照部頒之〈新學制課程大綱〉而編成《新學制教科書》；1927 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後，學制雖沒有重大的變更，然國民訓練的目標已以三民主義為基礎，商務印書館為協助貫徹黨義教育，也配合編寫《新時代教科書》。^[12] 但配合政策外也不乏例外，商務印書館之出書乃參酌時代發展以及政府政策，後者只屬原則，政策若與時代需求出入過大，張元濟則不予考慮。例如癸卯學制，清廷頒布奏定學堂章程，該章程中之初等小學章程規定每週須讀經 12 小時，張元濟向來反對強迫讀經，而且政府所訂讀經時數也不符社會實際的狀況，這些「新定章程所定小學科全然謬戾，不合教育公理」^[13]，故張元濟不配合辦理。

[11] 同註 2，頁 63。

[12] 商務印書館編，〈本館四十年大事記（1936）〉，《1897-1992 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我和商務印書館》（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附錄。

三、對《東方雜誌》發刊狀況的兩樣說法商榷

《東方雜誌》乃商務印書館頭號期刊。李歐梵在引用資料上存在一些粗糙的現象^[14]，他在〈印刷文化與現代性建構〉章針對《東方雜誌》明白說道：^[15]

我將集中討論商務印書館的教科書生產，聚焦於商務的最主要期刊《東方雜誌》的廣告上，以期在現代出版文化這個鮮為人涉足的領域投上新的光照。

並在這段文字後面，加註云：^[16]

在西方學術界，對《東方雜誌》和商務印書館都有專門的學術研究。因此我不再介紹它們的背景。關於商務的綜合研究，見 Jean-Pierre Drege（筆者按：應為 Drège）的《上海的商務印書館，1897-1949》*La Commercial Press de Shanghai, 1897-1949.....*。參見極有價值的紀念集：《商務印書館 90 年》，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

李歐梵一開始就清楚交代論述焦點鎖定在特定的印刷品——商務印書館的《東方雜誌》廣告。在展開論述之前，先以一節〈《東方雜誌》：一份中層刊物〉簡述該雜誌的內容特色，既然《東方雜誌》是重要文本，且在國、內外的藏書機構也應不難尋覓它的蹤跡，然作者對該刊之介紹，卻以辭典之類的工具書為參考依據，例如根據馬學新等編《上海文化源流辭典》說：^[17]

《東方雜誌》是一份在商務支持下面向都市讀者的「中層」刊物，創辦於一九〇四年，月刊，後改為半月刊，一直發行到一九四八年。

但在《上海摩登》中的另一處，則改說：^[18]

[13] 張樹年主編，《張元濟年譜》（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頁 48。

[14] 李歐梵其他著作如：《城市奏鳴曲》（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亦有引述資料方面的小疏忽，例「你亦可以看看上海出版的《萬象》」（頁 33），按：《萬象》是在瀋陽出版的刊物，它創刊於 1998 年 11 月，由遼寧教育出版社主辦，原為雙月刊，從 2000 年起改為月刊，李歐梵和柯靈、陳原等人，皆為該刊顧問，李歐梵自己也有文章如：〈我指揮的「搖船曲」〉、〈退休記事〉、〈憶金銓〉等文，分別登載在《萬象》之第 4 卷第 5 期（2002 年 5 月）、第 6 卷第 10 期（2004 年 11 月）及第 6 卷第 9 期（2004 年 9 月）。關於《萬象》可以參考遼寧教育出版社的網站 <http://www.lep.com.cn/wxzz/wxtg.htm>。

[15] 同註 2，頁 57。

[16] 同註 2，頁 57。

[17] 同註 2，頁 57。

[18] 同註 2，頁 60。按：本文匿名審查人表示：「李歐梵在這麼接近的前後頁，出現兩種不同的說法，以學術專著的標準來看，的確是不夠嚴謹，我們可以合理的推論，李是把『商務印書館，從其創辦的 1897 年……』，誤寫成了《東方雜誌》（見英文本，頁 51 最後三

《東方雜誌》，從其創辦的一八九七年到約一九四〇年後停刊。

究竟《東方雜誌》發刊情況如何？李歐梵的兩樣說法，何者為確？又，其認為關於《東方雜誌》以及商務印書館的研究，都已有專門的研究成果，故不贅言。問題是，按李歐梵所言學界不乏這方面的專著，那麼理應參考他自己認為值得參覽的資料，如法國戴仁（Jean-Pierre Drège）專著以及北京商務印書館所出的紀念集，假設作者曾讀過這些書，則《上海摩登》應不致於發生前述說法不一的情形。就以作者稱讚的「極有價值的紀念集」——《商務印書館九十年》為例，該書末所附〈商務印書館大事記〉表，於1904年欄，即註：「創刊《東方雜誌》」^[19]，而內容所收今昔之商務印書館同仁及其親友、作家、讀者的紀念文章中，亦有多篇提到《東方雜誌》創刊、編輯、銷售與影響等層面，如：

1904年創刊《東方雜誌》，風行全國，至1910年每期印數一萬五千份，銷路為當時全國雜誌之冠。^[20]

《東方雜誌》……創刊于1904年，原是一種選報性質的刊物，剪集每月報章雜誌上的記事、論文，分類刊登，供留心時事者查考，……1909年前的編者名徐珂，……後來又由孟心史（森）編過二年。1910年起，依理化部長杜亞泉的倡議，

行)。否則不太可能在前面說《東方雜誌》創刊於1904年，過了兩頁又說《東方雜誌》創刊於1897年。」審查人推測應該是「商務印書館，從其創辦的1897年……」，而李歐梵卻將商務印書館誤植為《東方雜誌》，審查人所言不無道理，因為商務印書館確實創辦於1897年，單就這兩句話是可以成立的。檢視英文本的第51頁，其完整的敘述為：“Almost every issue is filled with advertised lists of textbooks of various sorts, revealing a feverish publishing activity which was closely geared to the educational policies and laws of the government from the magazine’s founding in 1897 until its closing some forty years later.”（見Leo Ou-fan Lee,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51.）。中文本將之翻譯為：「《東方雜誌》，從其創辦的一八九七年到約一九四〇年後停刊，幾乎每期都充塞了各類教科書的廣告，清楚反映了針對國家教育政策和法規的積極的出版活動。」（頁60）比對中、英文，果真李歐梵原要表達的對象是商務印書館，那麼之後緊接著是「到約一九四〇年後停刊，幾乎每期都充塞了各類教科書的廣告」的敘述，整個脈絡顯然無法貫通了，也就是說李歐梵原意即指《東方雜誌》，否則後面的「停刊」、「每期」云云，如何與前面是機構性質而非刊物出版品的「商務印書館」這個名稱對應？筆者以為李歐梵要表達的是——《東方雜誌》裡常登載該館所出各類教科書的廣告，而從這些廣告內容往往也可看出當時國家教育政策或法規制訂的方向（因為商務印書館原則是配合教育制度和潮流發展而編訂適應時代需求的教科書，見筆者在本文第二節所述）。

[19] 北京商務印書館編，《1897-1987 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頁630。

[20] 曹冰巖，〈張元濟與商務印書館〉，《1897-1987 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頁22。

擴充篇幅，改三十二開本為十六開，模仿當時日本最暢銷的《太陽》雜誌形式……。革新以後，銷行到一萬份以上，打破例來雜誌銷數的紀錄。^[21]

這些訊息有助於從各個面向瞭解《東方雜誌》，並能補強作者以《東方雜誌》為研究對象的重要性。只不過作者所提的另一法籍學者戴仁的研究成果，其某些說法卻不無可商，以《東方雜誌》而言，戴仁指出：^[22]

《東方雜誌》的創刊號出版于 1904 年 1 月，直至 1948 年 12 月才（在中國大陸）

[21] 章錫琛，〈漫談商務印書館〉，《1897-1987 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頁 111。按：其他談及《東方雜誌》者尚有：「商務所出歷史最長的雜誌是《東方雜誌》。主編人先前更迭了很多。後來錢先生（按：錢經宇）繼『信父』（杜亞泉先生）主編，一編編了將近十年。在他主編時，該誌內容日新月異，銷數日擴，後來增加圖片及畫報，更由月刊改為半月刊，使該雜誌社業務一天天發達。」（俞頌華〈憶錢經宇（智修）先生〉，頁 99）、「『五四』運動後，胡愈之成為《東方雜誌》的主要編輯，他為《東方雜誌》的不斷革新盡了最大努力。『五四』前的《東方雜誌》，基本上只是翻譯介紹國外的科學技術和學術思想，還是資料性的刊物，胡愈之努力改革，使之逐漸成為學術性的刊物。」（胡序文〈胡愈之和商務印書館〉，頁 126）、「1904 年刊行綜合性的《東方雜誌》半月刊，廣銷國內外，影響很大，威信亦高。不少著名學者、作家，多在該刊上發表文章。有些青年作者因在《東方雜誌》上發表論文而成名。譬如梁漱溟……。」（賀麟，〈漫談我和商務印書館的關係〉，頁 332）等等。

[22] [法]戴仁（Jean-Pierre Drège），*La Commercial Press de Shanghai 1897-1949*（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1978），原係以法文寫成，此引中譯本，為李桐實所翻譯，書名《上海商務印書館 1897-1949》（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年），頁 18。按：戴書出版距今已逾二十載，或因限於當時史料不足，致其內容若干值得商榷，除《東方雜誌》外，還有其他如其於第一章〈商務印書館的誕生與成長〉中對該館創辦人與出資狀況做註云：「事實上日本人先給了 3750 元。」（中譯本，註腳 3，頁 8）此說亦誤，據張元濟與兩位創館股東高鳳池、張蟾芬的說法，創館伊始並無日資。另按：商務印書館創建之初，實為中國人獨資，直到 1903 年才有日資（日本金港堂）加入，唯中日雙方合資關係僅止於十年而已，即 1903 年至 1913 年。此根據 1914 年 1 月 31 日張元濟向商務印書館股東報告收回日股的紀錄所載：「光緒二十九年（筆者按：即 1903 年），有日商糾合資本來申開設書肆。本公司彼時編輯經驗、印刷技術均甚幼稚，恐不能與外人相爭，乃與之合辦。……夏總經理（筆者按：夏瑞芳）去年（筆者按：1913 年）十月親往日本與日股東商議辦法。日股東顧全大局，情願將股本讓渡，特派代表福間甲松君就滬商議。十一月間開始談判交涉，至月餘始行議定。……于三年（筆者按：1914 年）一月六日簽字。」此報告之會議紀錄見〈商務印書館股東會議記錄〉之「中華民國三年一月商務印書館股東非常會議」，收入宋原放主編，汪家熔輯注，《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 3 卷，頁 29-34。關於商務印書館創館情況，另可參汪家熔，〈主權在我的合資—1903-1913 年商務印書館的中日合資〉，《商務印書館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頁 21-31；劉怡伶，〈有關張元濟的若干問題考辨〉，《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67（2001.12），頁 155-165。

終刊。

或許戴仁不清楚中國的陰、陽曆之分，以致將創刊「1904年1月」之說視為陽曆，其實他這裡所言1月應為陰曆（即陽曆3月）才對。關於《東方雜誌》創刊與終刊問題，有兩方面的資料可供考察，就直接證據即有以下兩項：一、《東方雜誌》創刊號；二、在臺復刊本，見圖一之一及之二：^[23]



圖一之一：《東方雜誌》創刊號書影

圖一之二：《東方雜誌》復刊本書影

創刊號封面下緣註明：「光緒二十年正月二十五日發行」；復刊本封面則為：「民國前八年創刊」。另商務印書館的廣告也載道：「自甲辰年（筆者按：一九〇四年）起發行《東方雜誌》，全年十二冊，仿日本《太陽》雜誌、英《美而利費報》體裁，廣輯新聞，翻譯要件，材料甚富，價格極廉」。^[24]又，旁證其他商務印書館同仁以及近代史學者的文字陳述，如：張人鳳編《張菊生先生年譜》：「正月二十五日《東方雜誌》創刊」^[25]；王雲五著《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

[23] 圖片引自《商務印書館百年大事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東方雜誌》復刊7：1（1973.7）。

[24] 「商務印書館廣告」，載於：周振鶴編，《晚清營業書目》（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頁256。

[25] 張人鳳，《張菊生先生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頁56。

年譜》：「民前八年（公元一九〇四年，清光緒三十年，甲辰）商務印書館創刊東方雜誌」^[26]；史學家郭廷以編《近代中國史事日誌》「1904—光緒三十年甲辰」條云：「3，11（一，二五）『東方雜誌』在上海創刊」。^[27]另外，史學家金毓黻在1921年1月15日的日記裡也寫道：^[28]

去歲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而今則逐漸衰竭矣。去年新發刊雜誌不下百餘種，而今逐漸停版矣。人有譏《東方雜誌》陳腐者，然求之國內，運命之長則無與之相等者，今年之《東方雜誌》已為第十八年矣。凡辦何事業者，如《東方雜誌》之持久，與吾國之文化豈不有更巨大之補助哉！

金氏云：「今年之《東方雜誌》已為第十八年」，「今年」即1921年，故18年前亦即1904年。綜合前述，該刊創於民國前8年（光緒二十年，1904年）。

至於何時停刊，根據《東方雜誌》在臺復刊第1卷第1期〈東方雜誌復刊告各界書〉：「卅八年共黨竊國，神州陸沉，本刊再因國難被迫停版。」^[29]在民國38年停刊之前，《東方雜誌》已出刊至37年12月，卷次為第44卷第12號，因此1948年12月確為停刊之時間。又，北京三聯書店編輯部曾編《東方雜誌總目：一九〇四年三月——一九四八年十二月》^[30]，亦可佐參。是故，《東方雜誌》創刊1904年3月而停刊於1948年12月，在臺灣復刊則在1967年7月，發行23年之後，終刊於1990年6月第23卷第12期。^[31]

四、誤以《申報》為商務印書館刊物

李歐梵對商務印書館刊物的不熟悉，也反映在《上海摩登》的另一處，他

[26] 王雲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頁12。

[27]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2冊（臺北：正中書局，1963），頁1199。

[28] 金毓黻，《金毓黻文集》編輯整理組校點：《靜晤室日記》（瀋陽：遼寧書社，1993），第1冊，第6卷，頁214。

[29] 東方雜誌社，〈東方雜誌復刊告各界書〉，《東方雜誌》，復刊1：1（1967.7），頁6。按：《東方雜誌》從1904年3月創刊至1948年12月停刊，期間曾停刊五次，其原因與經過詳參黃良吉撰，《東方雜誌之刊行及其影響之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頁18-24。

[30] 三聯書店編輯部，《東方雜誌總目：一九〇四年三月——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北京：三聯書店，1957）。

[31] 《上海摩登》之第61頁所引《東方雜誌》之卷期云：「《東方雜誌》，1911年11月，8期，11」。此誤也，應為8卷11期。

說：^[32]

史華慈對嚴復的研究是開拓性的，但其研究並沒有涵蓋這些新的價值和思想觀在中國大眾出版業中的迅速擴散情況。在商務印書館的《申報》和《東方雜誌》上，這些新詞成了絕大多數文章的特色。因此到二〇年代，在精神和物質的所有層面上，人們就普遍地把「現代性」等同於「西方文明」了。

「在商務的《申報》和《東方雜誌》這樣的報刊上」，這句話只說對了一半，《東方雜誌》隸屬商務印書館的刊物，但《申報》可就不是了。當他進一步描述《申報》時，又謂：^[33]

最早採用西曆的是《申報》，該報最初由西人創辦，一八七二年開始在頭版並列標注農曆和西曆。

其說法前後矛盾，前指《申報》出自商務印書館，後稱由西人創辦，這兩說之虛實如何辨別？這個問題只要確認《申報》創刊時間，即可輕易解決。

顯然，第一號刊頭的左右兩旁，右邊寫著大清同治壬申三月二十三日，左邊為西曆 4 月 30 日，即創刊於 1872 年 4 月 30 日。但商務印書館成立於 1907 年 2 月 11 日（光緒二十三年正月初十），因此，怎可能在出版機構還未創設之 25 年前就已出版刊物呢？也就是說，《申報》根本不可能由商務印書館發刊，已毋庸置疑。李歐梵說該報最初由「西人」創辦，然西人為何人則並未明說。其實是來華的英國商人美查（Ernest Major, 1841-1908）^[34] 所創辦。圖二為創刊號首頁

^[32] 同註 2，頁 54。按：關於《申報》與《東方雜誌》是否均由商務印書館所創辦，匿名審查人謂：「檢視英文本，就會發現這是翻譯的問題，……在原文中，根本就沒有在申報及東方雜誌前加上商務所辦的字眼，這完全是翻譯者的誤植。」檢按李歐梵之英文原著，其作 “In Newspapers Such as Shenbao (Shanghai News) and Magazines Such as Dongfang Zazhi (Eastern Miscellany) publish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頁 44)，其中的 the Commercial Press，即商務印書館的英文名稱，李歐梵所用 A and B by C 的句式，意指 A、B 兩者均藉由 C，因此譯者翻成「在商務印書館的《申報》和《東方雜誌》上」，並未誤解李氏原意。該句若以「,」取代「and」，隔開《申報》與《東方雜誌》兩者，則單單指後者為商務印書館所刊。

^[33] 同註 2，頁 46。

^[34] 關於美查背景，可參〈報館開幕偉人美查事略〉，《申報》，1908.3.29（清光緒卅四年二月廿七日），第 12629 號所載：「美查，英人也。於同治初年來申，營洋布業，能通中國言語文字，於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創辦申報館、點石齋圖書集成印書局、江蘇藥水廠，次第建設。其時上海雖已通商，而報館印刷諸業尚未發達，故美查專以開通風氣、整興實業為己任，不僅區區為一己之利益已也，嗣以年老歸國，所辦各事，委人經理，顧其功偉矣。昨本館接美查逝世電耗，為之撫然者久之。美查享年七十有幾。功成名立，耄耋而終其志，固可無憾，惟當報館日形發達、工藝日益進步之秋，不能不大其開幕之偉功而惋惜其人也。本館爰為之述其事以誌哀悼。」另，同日第一張第四版亦刊出倫敦（按：原報誤植為「敦倫」）專電：「英國巨商美查（本館創辦人）因病逝世」。

書影。^[35]



圖二：《申報》1872年4月30日創刊號書影

五、其他問題

筆者指陳李歐梵在資料引用方面的粗糙，除了顯現於商務印書館的相關問題上，也出現在《上海摩登》其他部分，例如：「西班牙的 V. S. Pritchett」^[36]，其實普里柴特 (V. S. Pritchett) 為英國人而非西班牙人。又，「邵洵美那迷人的金屋書屋出的《金屋月刊》，它摹倣了英國布魯斯貝利 (Bloomsbury) 團體的《黃書》(Yellow Book)」^[37]，這話也只說對了一半，邵洵美創設《金屋月刊》，確實是模仿《黃書》，按《黃書》，或稱《黃皮書》、《黃面志》、《黃面書》，是 19 世紀末英國維多利亞時代頹廢唯美派的刊物，根據當時受邵洵美之邀而參與金屋書店編輯的章克標回憶道：^[38]

[35] 本文所引《申報》均據臺北漢鑫圖書縮影出版有限公司之微捲品。

[36] 同註 2，頁 151。按：筆者同意本文匿名審查人所云：「其人係英國短篇小說家，或因著有 *Marching Spain* 和 *The Spanish Virgin* 等書，而被李歐梵誤認為西班牙人。」

[37] 同註 2，頁 135-136。李歐梵在〈漫談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頹廢」〉一文中也提到：「我們略查英國文學史就會發現，《黃皮書》是 19 世紀末布盧姆斯伯里 (Bloomsbury) 這批頹廢詩人作家的出版物。」見李歐梵著，《中國現代文學與現代性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頁 67。

[38] 章克標，〈邵洵美與金屋書店、時代書店〉，收入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現代部分)》下冊，第 1 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頁 194。按：邵洵美之女邵綉紅也寫道：「金屋還出版了洵美以筆名『浩文』譯的英國最有名的線條畫家琵亞詞侶 (Aubrey

英國 19 世紀末有一種刊物被叫做 **Yellow Book** (黃面書)，是唯美派文學的濫觴，邵洵美十分愛重，就模擬仿效，也出了這種用黃色紙作封面的雜誌，叫做《金屋月刊》。

事實上，李歐梵在《上海摩登》書中論及邵洵美、葉靈鳳時也提到他們均受比亞斯萊《黃書》裝飾風格的影響。^[39] 其創刊號封面見圖三：^[40]



圖三：《黃書》創刊號書影

Beardsley) 的一本小小的、薄薄的詩畫集，他的畫別具一格。……洵美效仿他最喜歡的那份英國唯美派雜誌 **Yellow Book**，也用金黃色的封面。裡面用黃色毛邊厚紙，很新穎獨特。」見邵綉紅，《我的爸爸邵洵美》(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頁 57-58。

[39] 同註 2，頁 265，273。按：有「中國比亞斯萊」之稱的葉靈鳳，曾謂：「我一向就喜歡比亞斯萊的畫。當我還是美術學校學生的時候，我就愛上了他的畫。不僅愛好，而且還動手模仿起來，畫過許多比亞斯萊風的裝飾畫和插畫。」見葉靈鳳，〈比亞斯萊的畫〉，載於：絲韋編，《葉靈鳳卷》(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5)，頁 199。又，邵洵美的好友徐志摩所辦《新月》，亦模仿了《黃書》，據當年參與其事的梁實秋說：「新月雜誌的形式與眾不同，是一多設計了。那時候他正醉心于英國 19 世紀末的插圖畫家壁爾茲萊，因而注意到當時著名的《黃書》(The Yellow Book)，那是文圖并茂的一種文學季刊，形式是方方的。新月于是模仿它，也是用它的形式，封面用天藍色，上中貼一塊黃紙，黃紙橫書宋楷新月二字。」轉見：謝其章，〈傳呼快馬迎《新月》〉，《創刊號風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頁 27。

[40] 圖片引自紫圖大師圖典叢書編輯部編著，《比亞茲萊大師圖典》(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

這本雜誌封面註明創刊時間為「April 1894」，封面設計者就是比亞斯萊 (Aubrey Beardsley, 1872-1898)，他對雜誌的裝幀和版面設計十分考究，色彩使用鮮明的黃色，封皮似為硬紙版材質，乍看彷彿一本書，以創刊號此期封面為例，其特色為：^[41]

一個戴著寬沿帽子、黑色假面的肥胖婦女露出喜劇性的笑容，而她身後的同樣戴著黑色假面的男子則露出居心叵測的邪惡表情，畫面左側有一根冒出縷縷輕煙的蠟燭。作為封面設計，這樣構圖並不複雜，但是它很好地勾起了讀者的閱讀欲望，想要探詢具有這樣封面的雜誌其內容是什麼。

比亞斯萊從 1894 年 4 月創刊開始就為《黃書》繪製插圖，直到 1895 年 4 月因為王爾德事件而被迫離開，他離開後，該刊繼續出版了若干期，「因為其變得循規蹈矩而逐漸失去影響力，不得不最終停刊」。^[42] 至於「布魯斯貝利團體」(Bloomsbury Group) 則是指 20 世紀位在倫敦大英博物館附近的沙龍 (藝文圈)，英國傑出女作家、西方女性主義先驅者——維吉尼亞·吳爾芙 (Virginia Woolf, 1882-1941)，其丈夫即是布魯斯貝利集團的成員倫納德·吳爾芙^[43]，該團體主張要有自由的人際關係，其成員多半來自學風較為自由開放的劍橋，例如小說家福斯特 (E. M. Forster, 1879-1970)、經濟學家凱因斯 (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 等人。綜上所述，19 世紀末出現的《黃書》與 20 世紀初所形成的「布魯斯貝利團體」應無涉。^[44]

社，2003)，頁 29。

[41] 此分析，參見：紫圖大師圖典叢書編輯部編著，《比亞茲萊大師圖典》，頁 28。按：比亞斯萊與該刊的關係非常密切，著名作家海德 (C. Lewis Hind) 說：「比亞茲萊為每期《黃面志》的封面和封底所做的幾近輕佻之插圖，我們每次都會因而去翻閱此季刊，然而當其插圖作品因為他臥病而缺席時，此季刊就會變得空洞貧乏。」(前揭書，頁 28)

[42] 紫圖大師圖典叢書編輯部，《比亞茲萊大師圖典》，頁 104。

[43] 這個文藝圈成員，在個人性愛方面多偏向同性，即使吳爾芙有正式的異性婚姻關係，亦與其他女子發展同性之戀。儘管如此，亦無損讀者對吳爾芙的欣賞，愛德蒙·懷特 (Edmund White) 即謂：「美國人從一開始就欣賞維吉尼亞·吳爾芙，而且不在意她那些令人尷尬的布魯茲貝里 (Bloomsbury) 文藝圈的友人。」載於：愛德蒙·懷特著，李桂蜜譯，《巴黎晃遊者》(The Flâneur: A Stroll through the Paradoxes of Paris) (臺北：馬可孛羅文化，2005)，頁 35。

[44] 《黃面志》與布魯斯貝利團體沒有瓜葛，趙武平〈李歐梵的摩登上海〉，《中華讀書報》，2000.9.27。此文也提及這點，唯趙氏所指比亞斯萊擔任該刊美術編輯時說：「時在 1894-1995 年間」之語，顯然誤植年份了，因比亞斯萊早在 1898 年過世，趙文中之「1995」

另外，「冀一新」應作「紀一新」；〈漢漫錄〉應為〈汗漫錄〉。^[45]其他如：繁簡體字夾雜、標點符號標示稍亂、小部分參考書籍未註明出處與出版時間、譯名不統一等小疵，這些儘管在最新的增訂版裡部分小瑕疵已修正，但仍有上述的現象，此相對於整體深具宏觀視野的研究專著，固屬微不足道之枝節，但偶見小誤、小疵，總是稍嫌美中不足。

六、結 論

李歐梵自比為「狐狸型」的學者，看問題常旁敲側擊，這裡聞聞、那裡嗅嗅，他說：^[46]

我的「狐狸性格」不改，作學問也是旁敲側擊，這裡聞聞，那裡嗅嗅，而且最愛「越界」一到其他相關領域去打游擊戰（美其名曰「跨學科研究」）。

又云：^[47]

我也自稱「雜家」，非但興趣很雜，即使在本行專業研究的方法上也很雜亂，然而我也自鳴得意。兼容並包本來也是「狐狸型」學者的特徵，但我自認汲取了各方學問的精華，並且練就了一套反芻的功夫，不時把累積放在肚子裡的东西重新品嚐過濾一番，然後再活學活用到自己研究的新題目上去。

對於有人說他只是見林不見樹、認為他是「二流學者」，只是傳播一些新知識而已，並無原創性的發明和貢獻。對此，李歐梵非但不以為忤，更自我解嘲：「二流學者，三流作家」。^[48]

又有一些大陸學人往往拘泥歷史的大敘述，如：階級、愛國、鄉土等理念來看問題，他們站在這種既定立場，在意識型態的框框下，對李歐梵大加撻伐，云本書過於關注上海的上層生活風貌，忽略當時社會底層的勞工民衆，認為李氏的理解和描述，有著明顯的傾斜，例如曠新年指出：^[49]

《上海摩登》重繪了一幅夜晚的地圖、消費的地圖、尋歡作樂的地圖，同時卻遮蔽了白天的地圖、生產勞動的地圖、貧困破產的地圖，從根本上來說，也就是用一

應為「1895」。

[45] 同註 2，頁 190，55。

[46] 李歐梵，《我的哈佛歲月》（臺北：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5），頁 195。

[47] 同註 46，頁 204。

[48] 同註 46，頁 201。

[49] 曠新年，〈另一種「上海摩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2004），頁 291。另按：李歐梵《上海摩登》根據穆時英《公墓·自序》的敘述，認為《上海的狐步舞》與《中國

幅資產階級的地圖遮蔽了無產階級的地圖、用資產階級的消費娛樂遮蔽了無產階級的勞動創造。

這樣的批評固然點出李書的一大特色，但「摩登」本來就與上層社會關係較近，因此李歐梵偏向這面向的研究，勢所必然，似無可厚非，除非他原本要全面處理三、四十年代上海的種種，否則「非摩登的」研究很自然就不是作者鎖定的焦點。

其實李歐梵也不否認自己在文本解讀、史料鉤沉方面的不足，如果有所謂的「傳統研究」與「新潮研究」之分，那麼顯然李歐梵比較注重理論的新潮研究，但又不同於一些過分預設立場的學者那樣偏頗；而傳統研究強調原始材料的蒐集與整理的功力，這部分李歐梵就較為不擅長了。儘管如此，這並不會減損李書的成就，因為從事文學現象或報刊研究，誠如陳平原所言：「需要較強的理論眼光和綜合把握能力。」^[50] 李歐梵的眼光與理論修養，正提醒其他研究者不能只限於細節的糾纏，而是要有問題意識，方能見其大、撐起整個論述架構。

李歐梵個性其實有一點像美國哈佛大學畢業的前輩吳宓（1894-1978）^[51]，他們對人、對生活抱持真誠態度，既不矯情也敢於表達。又，不自我膨脹，懂得欣賞他人的優點，亦不避諱自暴其短。能瞭解李歐梵之理性（學者）與感性（文人）兼具的本性，就不難理解何以他可以寫嚴肅的學術專著如《上海摩登》等作，亦能盡情揮灑如《狐狸洞話語》、《世紀末囁語》等生活隨筆，並與妻子李

一九三一》的關係是：前者是後者的一部分，但後者始終沒寫就（頁 237）。據曠新年的考察，此小說曾連載於 1932 年 11 月至 1933 年 1 月的《大陸雜誌》（上海）第一卷第五至七期上，計六萬餘字。曠氏甚至以此質疑作者忽略穆時英受左翼文學「影響的焦慮」的成分，難以真正了解穆時英的創作內涵，而《上海摩登》對上海現代性的這方面討論，採取迴避態度，曠氏更不客氣地批評道：「有著明顯的片面性和根本的盲視」。此載於：曠新年，〈穆時英的佚作《中國一九三一》〉，《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4（2003），頁 43。

[50] 陳平原，〈報刊研究的視野及策略〉，《晚清文學教室：從北大到台大》（臺北：麥田，2005），頁 37。

[51] 吳宓，於 1911 年入清華學堂，1917 年赴美留學，先後入弗吉尼亞大學英國文學系、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就讀，1920 年獲哈佛大學學士學位，其後獲哈佛大學碩士文憑。歸國後，曾在東南大學、清華大學等校講授西方文學課程，並主持清華國學研究院而延攬四位大師（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於該院任教。此外其曾主編「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學衡》雜誌及《大公報》之「文學副刊」等刊物。關於吳宓及其與新文化運動者之間論點的異同，可參劉怡伶，〈吳宓對新文學運動的反省〉，《中極學刊》，第 2 輯（2002.12），頁 177-199。又按：李歐梵曾稱讚吳宓那一輩學者，工夫紮實，無論是國學古文還是西方古典

玉瑩合著《一起看海的日子》。此外，也常在雜文、小說中不時流露對音樂的喜好，甚至撰成《音樂的往事追憶》。反觀其他許多學者在面對學術社群時，常常會把生活中的真實隱埋，假裝不存在或是全然將之區隔，但李歐梵卻能坦率地面對生活中的真實，這樣開放的心靈、人格特質，反映在他的學術研究上，就能很寬的去看不同的進路，走一條性之所近的路數，誠如李妻所言：^[52]

他平易近人，性情爽朗中又不失醇厚。治學方面他不中不西，卻又是既中亦西，英文寫得了得，中文更是揮灑自如。

《上海摩登》最可貴之處就在於觀點往往深具啓發性，作者開了引子，拋出問題而使其他學人能進一步發揮，此不能不說是發揮了另一層面的影響。李歐梵回憶撰寫《上海摩登》經過，謂：^[53]

以犧牲晚餐的時間，把我的《上海摩登》一書寫好了。

又據妻子轉述李歐梵的話：^[54]

在我獨居的日子裡，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我的課教完了，總會留在辦公室寫我的書《上海摩登》，從下午五時開始，中間稍作休息，到科學中心吃一份簡單的晚餐，通常是三明治或一大塊義大利披薩，又匆匆的趕我寫我的書。直至晚上十時左右，才拖著疲累的身心回家。

《上海摩登》就在這樣簡單的晚餐果腹、無數寂寞的夜晚，振筆直書而成，縱使若干資料的運用值得商榷，整本書予人之啓發作用仍值得肯定，此是該書之長。他也坦承在某方面並無深究，漢學底子也沒有老一輩那樣紮實。在坦率之外，其若能親自檢索文獻，花些時間儘可能找出相關資料，則前面所述若干值得商榷的粗糙情況自能避免了。

（收到日期：94.11.9）

參考文獻

三聯書店編輯部。《東方雜誌總目：一九〇四年三月——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北京：三聯書店，1957）。

王雲五。〈張菊老與商務印書館〉，《傳記文學》，4：1（1964.1），頁16。

基礎，他認為自己在這方面的素養不如吳宓那一代，載於：《我的哈佛歲月》，頁207。

[52] 同註46，頁240。

[53] 同註46，頁182。

[54] 同註46，頁244。

- 王雲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頁12。
- 北京商務印書館編。《1897-1987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頁630。
- 宋原放主編，汪家熔輯注。《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3卷（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頁29-34。
- 李歐梵（Leo Oufan Lee）著，毛尖譯。《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增訂本（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6）。
- 李歐梵。《中國現代文學與現代性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頁67。
- 李歐梵。《我的哈佛歲月》（臺北：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5），頁195。
- 李歐梵。《城市奏鳴曲》（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 汪家熔。〈主權在我的合資——1903-1913年商務印書館的中日合資〉，《商務印書館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頁21-31。
- 《東方雜誌》，復刊第7：1（1973.7）。
- 東方雜誌社。〈東方雜誌復刊告各界書〉，《東方雜誌》，復刊1：1（1967.7），頁6。
- 邵綉紅。《我的爸爸邵洵美》（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頁57-58。
- 金毓黻。《金毓黻文集》編輯整理組校點：《靜晤室日記》（瀋陽：遼寧書社，1993），1：6，頁214。
- 俞頌華。〈憶錢經宇（智修）先生〉，頁99。
- 胡序文。〈胡愈之和商務印書館〉，《1897-1987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頁125-130。
- 胡適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主編。《胡適的日記》（香港：中華書局，1985），頁23-24。
- 《商務印書館百年大事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 「商務印書館廣告」。載於：周振鶴編。《晚清營業書目》（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頁256。
- 商務印書館編。〈本館四十年大事記（1936）〉，《1897-1992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我和商務印書館》（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附錄。
- 張人鳳。《張菊生先生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頁56。
- 張人鳳。《智民之師——張元濟》（濟南：山東畫報，1998）。
- 張樹年。《我的父親張元濟》（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7）。

- 張樹年主編。《張元濟年譜》（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 曹冰巖。〈張元濟與商務印書館〉，《1897-1987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頁22。
-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2冊（臺北：正中書局，1963），頁1199。
- 陳平原。〈報刊研究的視野及策略〉，《晚清文學教室：從北大到台大》（臺北：麥田，2005），頁37。
- 章克標。〈邵洵美與金屋書店、時代書店〉，載於：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現代部分）》下冊，第1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頁194。
- 章錫琛。〈漫談商務印書館〉，《1897-1987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頁111。
- 〈報館開幕偉人美查事略〉，《申報》，1908.3.29（清光緒卅四年二月廿七日），第12629號。
- 紫圖大師圖典叢書編輯部編著。《比亞茲萊大師圖典》（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頁29。
- 賀麟。〈漫談我和商務印書館的關係〉，頁332。
- 黃良吉。《東方雜誌之刊行及其影響之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頁18-24。
- 愛德蒙·懷特（Edmund White）著，李桂蜜譯。《巴黎晃遊者》（*The Flâneur: A Stroll through the Paradoxes of Paris*）（臺北：馬可孛羅文化，2005），頁35。
- 葉宋曼瑛。《The Life and Times of Zhang Yuanji 1867-1959》（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
- 葉宋曼瑛著，張人鳳、鄒振環譯。《從翰林到出版家——張元濟的生平與事業》（香港：商務印書館，1992）。
- 葉靈鳳。〈比亞斯萊的畫〉，載於：絲韋編，《葉靈鳳卷》（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5），頁199。
- 趙武平。〈李歐梵的摩登上海〉，《中華讀書報》，2000.9.27。
- 劉怡伶。〈有關張元濟的若干問題考辨〉，《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67（2001.12），頁155-165。
- 劉怡伶。〈吳宓對新文學運動的反省〉，《中極學刊》，第2輯（2002.12），頁177-199。
- 戴仁（Jean-Pierre Drège）著，李桐實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897-1949》（*La Commercial Press de Shanghai, 1897-1949*）（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頁18。
- 謝其章。〈傳呼快馬迎《新月》〉，《創刊號風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3) , 頁27。

曠新年。〈另一種「上海摩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2004），頁291。

曠新年。〈穆時英的佚作《中國一九三一》〉，《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4（2003），頁43。

The Discussion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Leo Oufan Lee’s work of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Yi-ling Liu

Abstract

Leo Oufan Lee’s classic work,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not only has macroscopic views but also enlightens the readers in many ways. However, in the issue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there are some views need to be discussed and renewed. There are three aspects discussing in the article. First of all, Leo Lee neglected to mention a major person Zhang Yuan Ji who was the manager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Secondly, the statement of issuing magazine of *The Eastern Miscellany* was inconsistent comparing to the reality. Finally, *Shenbao* was misconceived as a publication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Keywords (關鍵詞) : Leo Oufan Lee ; Shanghai ; Modern ; The Commercial Press ; *The Eastern Miscellany* ; *Shenbao* ; Zhang Yuan Ji ; Publishing

李歐梵 ; 上海 ; 摩登 ; 商務印書館 ; 東方雜誌 ; 申報 ; 張元濟 ; 出版

Yi-ling Liu :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
E-mail: ncnuncue@yahoo.com.tw

